

第四章 | 波兰之劫

(1715—1795)

波兰一览 (1715—1764)

地理状况、种族、宗教和政治情形都是波兰先天的敌人。它的国土面积与法国相当，就1715年的疆界而言，西自奥得河起，东则一直延伸至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然而，它没有高山、大河的天然疆界在东西两界作为国防上的屏障。其国名本源自“Pole”（意即田野或可耕地），而该字正是平原之意。它本土上可以说只有一个出海口，即但泽。另外的维斯图拉河出海处，因为太接近普鲁士，所以根本谈不上防卫。民族的构成也不单纯：占多数的波兰人有650万人之多（1715年），还有德国人、犹太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等少数民族，互相火拼，尤其是条顿人和斯拉夫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世仇。宗教上也不统一，罗马天主教教徒占多数，统治并压迫“异教徒”，包括新教徒、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本身也不团结。政治上更无团结力可言，因为最高权力掌握在完全由贵族组成的国会手中，而每位代表凭其自由否决权，可以取消其他代表的任何提案，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任何会期或任何一期国会中途夭折。国王由国会选举，同时一切遵照“约定”，这是他签了名作为选他的交换条件，其实即使有任何接替王位和获得稳固的支持力的保证，他也实行不了长期政策。贵族要求毫无限制的立法权，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完全自由地管理其土地与奴隶。然而，自由的精义就是它本身也要受限制。它不受限制时，那也就

等于被宣告死亡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了。索别斯克之后的波兰史，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大事记。

几乎全国的土地都由封建体系下的农奴耕作，但农奴毫无上诉权。虽然地主有时显得非常仁慈，但他们通常更像是专制君主。农奴不但要交给他们要求的生产量，同时每周要在田庄内工作两三天，作为对主人恩德的报答。幸好，波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民尚能糊口。但是，库克西形容他们“比我在旅游中见过的所有百姓还要穷困、贫贱和悲惨”。他们的主人只是低阶的贵族或乡绅（*Szlachta*）而已，他们还要向他们头上的几百位拥有或控制广大地区的大地主效忠，绅士阶级充任国家行政机构的大部分职位。理论上他们也控制国会，事实上，波兰的政治是由大地主或其家族控制的，他们以经济上的影响力或直接以贿赂手段，操纵绅士阶级彼此明争暗斗。

在波兰，家族仍然保留其超越国家的原始优先权，拉德兹维尔、普土克斯、卡扎托斯克斯三大豪门，其个别的家族情感紧密结合的程度，胜过任何国家民族的同属感所能产生的联结力。在此意义下，爱国心的表现成为对父亲的尊重，尤其是对族中长老的尊重。家族如同机构一样地刻板，因为那是经济生产和道德纪律的单位。因而，在此制度下从来没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没有子孙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为政的情形。一般说来，孩子们都留在祖产的事业上，而只要其父仍在，就完全听命于父亲。家族因为权威的统一而飞黄腾达，缺少这种统一性的，则势力日减。所有家族的财富都由父辈们集中管制，很多家族由于其产物与出口的再投资利润，财富不断累积。结果，竟有一些家族在财富方面超过国王。18世纪，波兰20大家族每一家族每年在家务开支上，都要花上20万利维尔，权势赫赫的家族将自己的家当作宫廷，既有家臣、私有军队、无数的侍仆，又有类似皇家的排场。比如卡诺尔·拉德兹维尔，他的领地有半个爱尔兰那么大，在1789年一次4000名宾客的大宴中，就花了100万马克。

波兰最有名的家族是卡扎托斯克斯，家喻户晓，被直称为“大家族”。自15世纪以来，它一直占有王侯之位，同时与1384年至1572年统治波兰的乔治尔奥家族联婚。立陶宛副首相卡斯米尔兹·卡扎托斯克斯亲王与伊莎贝拉·莫施蒂因的婚姻（1741年），也使这一家族吸收了法国文化。她带给他3位有名的孩子，其一为弗雷德里·米西尔，后来成为立陶宛的首相；其二为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后来成为“红俄罗斯”有王权的亲王；其三为康斯坦蒂娅，她与斯坦尼斯拉斯一世结婚后，生有一子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个孩子后来成为波兰历史上最富悲剧

性的人物。

卡扎托斯克斯家族另一渐趋明显的特色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其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衍生。他们很早以对俘虏行人道的待遇而闻名。当时一位人士说：“若我生而为奴隶，我愿意做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卡扎托斯克斯亲王的奴隶。”他们建学校给小孩子们就学，供给他们教科书，建教室、医院和模范乡村。他们召来老师与学者，在其位于普劳维（Pulawy）的田庄与别墅里，为国家教导出生于任何阶级的有为青年。政治上，他们极力反对自由否决权的行使，因为他们主张建立有效率的政府。但是，许多家族反对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否决权是他们防止君主集权专制的唯一方法。其中最强硬的反对派是普土克斯家族，这一家族的领导人物弗里希·波托茨基侯爵，在乌克兰有300万英亩的领地，他巡视时，可以从任一方向行30英里，而不出其领域。

16世纪，工业与商业曾使波兰国家壮大，城镇繁荣，然而地主与受地主摆布的国会两者的敌视，导致其发展停滞不前。很多城市恰好坐落在封侯的私有领地内，而这些封侯力赞农业反对工业，因为他们唯恐独立的中产阶级会因之兴起。此外，庄园内的农奴手工业的竞争，使城镇的工业受挫。安东尼·波托茨基于1744年写道：“城市荒芜得很，我们只要一望即知，除了华沙一地外，全国第一大的城镇大概只有盗匪巢穴一般的规模而已。”利沃夫（Lvov）的街道杂草丛生，有些广场已成旷野。克拉科昔日为欧洲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沦落为只剩9000居民的寂寞小城，显赫一时的大学，也只剩下600个学生而已。

城市的荒废部分归因于叶卡捷琳娜的再度征服。许多被驱逐的新教徒以前都是商人和工匠人；除了波兰西部（那里无数日耳曼人留了下来），波兰新教人口的锐减使波兰土地尽归地主所有，这些地主若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就是居于东方的东正教徒或唯一神教派教徒（承认教宗的最高权威，但仍保留其东正教仪式的教徒）。占全国总人口8%的异教徒包括新教徒、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被排除在政府公职与议会之外。所有对他们的诉讼都由天主教徒组成的法庭判决。宗教仇视已达到顶点。1724年，在多由新教徒居住的地区托伦城，民众因为愤懑一个耶稣会学生的行为，而污辱圣体，践踏圣母像。9个滋事者被判处死刑。波兰的新教徒于是向南部的普鲁士求助，希腊正教教徒则向东方的俄国求援。俄普两国都伸出援手，因此步向入侵与瓜分波兰之途。

波兰人的德行在桌上宛如德国人，在床上则一如法国人。农民因需要照顾其土地和妻子，所以长久习惯于一夫一妻制。但在首都，这一制度实难以维持，因为女

人既美又富“诱惑的仪态”，而她们又不许她们的良好教育来收敛她们的魅力。据说，华沙的女人在性生活方面的放纵，堪与巴黎女人相比。波尼托夫斯基向我们保证过他到22岁时仍是处男，但他又补充说明，有这样的操守在他那个阶层里实属例外。酗酒不分阶级，普遍流行。在农民中，它可带来暂时的遗忘，忘掉贫穷、艰苦与寒冷。在贵族中，则可安慰他们的孤独与烦恼。所有阶级的男士都视酗酒为一种成就而非罪恶。潘·库玛西泽乌斯克能够一次饮尽一大桶香槟，而面不改色、神志清醒，这使他深以为荣。波尼托夫斯基更被警告说，除非他一周醉酒两次，否则将失去民心。好客的风气全国盛行，但好客程度的高低全看被款待客人的酒量而定，有时，竟需以一大片土地或以一个城镇作抵押以备盛宴之需。

受过教育的波兰人，更以其服饰来点缀周围的景观。农民在夏天，随便穿着以粗亚麻做的衬衫与膝裤，既无袜子又无鞋子；在冬天，则裹着厚厚的衣服，从不讲究颜色，也没有时间修饰。为数72.5万人的绅士阶级则不然。他们脚穿马靴，头顶羽帽，身着丝制或绣花边的彩色袍子，腰际系着一条宽大有图案而且色彩鲜艳的织带。这一身神气十足的民族服饰是立陶宛人在乌克兰与土耳其人接触后而引进的打扮。这也可代表波兰人与土耳其人为对抗奥地利或俄国而行的临时结合，它也许表现出波兰人的行为举止与性格带有某种亚洲的风味。

具有文化传统的波兰在1697年至1763年，却因其萨克森诸王对斯拉夫文学与艺术的不关心和两次蹂躏全国的大战，而毫无进步。天主教会不但是首要的艺术赞助人，而且也是教育的教导者和知识与文学的主要来源。它处心积虑地将波兰带到西方的科学与哲学运动的洪流之外；不过，在这一范围内，它也推广了知识，教化了民众。基辅主教约瑟夫·扎鲁斯克在华沙替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的图书馆收集了20万册的书卷，1748年，他将该馆开放给大众使用，并送给国家。而他自己生活俭朴，在力保波兰独立的战争中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促使年轻而热切的教士斯坦尼斯拉斯·卡纳尔斯基改学历史与法律的，也正是这位基辅主教。卡纳尔斯基编纂的从卡西米尔大帝到他那个时代的波兰法典，在1732年出版了四卷中的第一卷。对于他而言，这些和其他一些研究，显示出波兰很可悲地漂浮在文艺复兴的潮流之外。他深信，若要再生，必须从上层做起，因此他在华沙建立一所贵族学院（1740年），家世上等的青年可在那里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仅学数学、古典语言与文学（耶稣会教士在这方面的教育是颇有成果的），而且研习自然科学与现代语言。这真是值得称赞的创举，因为他既无财源，又无教科书，师资与学生俱缺，然而在15年的辛劳耕耘后，贵族学院成为一所有名望而为

人赞誉的学校，更成为波尼托夫斯基执政期间文化兴盛的源泉，也是1791年开明宪法诞生的主力。他呼吁改革波兰语言，剔除拉丁字句和华而不实的修辞。但全国都表示反对，仍旧照学传统语言不误。卡纳尔斯克于1760年至1763年出版了波兰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论著，标志着其事业与声名达到最顶峰。该论著虽称为《论辩论的有效行使》（*On the Effective Conduct of Debates*），表面上看来毫无政治色彩，其实是对自由否决权的口诛笔伐。对否决权虽然另有许许多多的抗议，但1764年后，国会还是被自由否决权瓦解了。波尼亚托夫斯基改革的波兰宪政是由于得到卡纳尔斯克的助力而开始的。

在波兰逐渐苏醒并重见光明之前，它一直要在萨克森王的统治下，痛苦地度过67年的混乱、屈辱和败亡的苦痛岁月。

萨克森诸王（1697—1763）

波兰国会通过提案，将伟大的索别斯基之子的波兰王冠，交给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这位选帝侯因与天主教和解，一夜之间成为波兰王（强者）奥古斯都二世。瑞典的查理十二被斯坦尼斯拉斯一世取而代之（1704年），查理在波尔塔瓦被打败（1709年），而奥古斯都重得其王位。奥古斯都在18世纪的诸君王中，享有最少的立法权，但享有王室所有的性生活特权。由于他没有能力治理波兰，他将他的爱人送回萨克森美化德累斯顿，然后沉溺于啤酒中，在女人身上消耗他的生命力，而这些女人中只有一个是波兰美人。在他执政晚年，他打算将波兰瓜分给奥地利、普鲁士和萨克森三国，但他在实现这一罪恶前就死了（1733年2月1日）。他在其临终的床上说：“我的一生真是恶贯满盈。”这真是肺腑之言。

在选举国王的会议召开期间，法国公使利用银弹攻势，赢得议员和官员们关于恢复斯坦尼斯拉斯王位的保证。自被贬之日起，斯坦尼斯拉斯一世就在阿尔萨斯静候。1725年，他女儿玛丽和法王路易十五结婚，成为法国皇后。因此，路易希望他岳父复位，而执行法国联合普、土两国以围堵奥地利的政策。但是，俄国政府唯恐这样一来会削弱俄国对抗土、普那种势难避免冲突的力量，也运送了大批卢布到华沙设法阻止法国的预谋。结果，利维尔压过卢布。1733年9月10日，斯坦尼斯拉斯成为波兰王。

但是一群少数派拒不承认该次选举，于是他们拉拢俄国，当时俄国军队已进至

维斯图拉河，而且宣布萨克森选帝侯为波兰王奥古斯都三世（10月6日）。由此兴起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俄国首次决定性地干涉波兰事务。斯坦尼斯拉斯期盼有一支波兰军队护卫他，但除了纸上所载的外，看不见真的一兵一卒。他逃到但泽，乞求法国援助。法国政府当时由弗勒里大主教主政，而他不想与遥远的俄国作战，因此只派一支2400人的军队前往。对峙的结果，1.2万名俄军自然以量取胜。斯坦尼斯拉斯逃离但泽，退隐洛林。1736年1月，他签了退位书。7月，奥古斯都三世成为波兰王。

但是，他治理这个混乱不堪的君宪国家，比斯坦尼斯拉斯更加不适合。一度，他与卡扎托斯克斯合作，欲制止自由否决权的行使。波托茨基却不时地动用自由否决权来保有该制。奥古斯都终于放弃努力，而逍遥在德累斯顿，很少回波兰。贪污贿赂不但横行如常，甚至更加恶化。国王无法改善，只好与它合流，于是他也将官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大地主控有军队与法庭，他们直接与外国强权谈判，而得其资助。法、奥、普、俄四国展开竞争，希望能从这即刻就要瓦解的国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在奥古斯都临终与死后（1763年10月5日死亡）的一段时间，提名其后继者的竞赛，花样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外交手段竞相登场，也有“战争边缘”的运用。波托茨基号召建立一支10万人的常备军，以保护波兰免受外强的宰割。卡扎托斯克斯家族则退到俄国的荫底下，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妥协。俄国声称有波兰境内占少数的希腊正教徒的保护权，并追溯至800年前圣弗拉基米尔（St.Vladimir，约956—1015年）时代，东波兰省是从俄国手中被夺走的。法国则赞同奥古斯都三世之子承继王位，因为若俄国控有波兰，整个法国对东方的外交政策都要失败。腓特烈大帝因刚结束对法奥的7年艰苦战争，需要得到助他逃过灾难的叶卡捷琳娜的友谊。因此，他同意支持她的波兰王位候选人，同时与她签了条约（1764年4月11日），秘密地约定反对任何对瑞典或波兰宪政的改变，否则王权的增大会导致这两者或其中之一危险的扩大，他们提议要以自由之名来制止混乱。卡扎托斯克斯之所以为叶卡捷琳娜的绥靖劝服，是因为她保证在情势恢复稳定后，支持他革除自由否决权，同时，她要选定受他们家族保护者之一，即他们的家臣为王位候选人。1764年9月7日，在卢布的攻势与3里外的俄军逼近之下，国会一致通过选定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为王。

波尼亚托夫斯基

他生而为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克拉科总督，后于1732年1月17日投效卡扎托斯克家族。他告诉若弗兰夫人说：“我在极其严厉的教养中长大，在今日你们找不到像我母亲那一类型的女人，我父亲则仅以他本身为典范来教诲我。”年方十六，他即开始出国游历。1753年，他的外貌、风度和年轻深深地令若弗兰夫人为之迷醉，也吸引了她整个沙龙的人士，他几乎风靡全巴黎。几年之后，他也跟着时尚，写了一段自画自剖的文章，其中所述与真实情形完全符合：

若我再高一英寸，若我的鼻子稍微不那么又勾又直，我的嘴再稍微小一点，则我对我的外貌身段就完全满意了……虽有这些瑕疵，我相信我的面部是高贵而富有表情的，我的外形是出众的……我的近视常令我看来有点笨拙，但这种感觉只是片刻的。的确，我容易触怒别人，因为我太走相反的极端，也就是行径太过高傲。美好的教育使我能够弥补我心智和身体上的缺陷，因此很多人对我的期望，比我能做到的还多。我的机智使我参加任何谈话，但总是无法持久和太过频繁。然而，我生性具有的同情心与友爱心总是一大助力。我天生对艺术有癖好……但是我的惰性令我无法深入艺术与科学。我不是做得太过分就是全然不做，我对事物的判断力不错……但是我特别需要好的建议，来帮我实现我自己的任何计划。我易受感动，但常为悲伤而较少为快乐所动。我很快就会懊恼……我喜爱时，我喜爱得极其狂热……我不报复别人。虽然在激动的片刻之间，我很想报复敌人，但我从未将这种意愿实施。因为同情心总是及时介入。

观察自己、表达自己如此得当，正表示波尼亚托夫斯基是生而为思考与写作，而非为计划与施行的人。他遇见过孟德斯鸠，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有法国社会那种心智上的优雅与细腻之风，并带有相当程度卢梭表现出的那种感情。他对女人很敏感，每每觉得她们给予他的，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是无价的。曾经有过谣传说，他在巴黎负债累累，而后因之被捕，但在被监禁一小时后获释，因为若弗兰夫人替他偿还了10万利维尔的债务。

在巴黎过了5个月、学会了英语之后，他到英国去。他参观了好几次国会的会议，一心想要以孟德斯鸠描述的英国情形来改造波兰的情势。旅游结束回国后

(1754年)，他被任命为立陶宛的高级总管。一年后，他陪同查理·威廉亲王前往俄国，此行结果令人颇为满意。1756年回国，1757年以波兰大使的名义再度前往圣彼得堡。后因参与1758年欲图推翻伊丽莎白的阴谋，被迫即刻离开俄境。叶卡捷琳娜那时的确对他的离去感到悲痛，但后来在支持他为波兰王时，已不是因为她仍喜爱他，而是因为（据她的说法）他比起别的候选人来力量最小，因此会更为感激她的支持。至于他本人，则从未从兴奋而难以忘怀的短暂结合中清醒过来。他回忆中的叶卡捷琳娜是心肠尚未被权力硬化的女人，他对她的一股迷恋即使在她利用他作为统治的工具时仍然存在。

在他被选为王时，他告诉若弗兰夫人：

我亲爱的妈妈：自从前天起，如此称呼你似乎是我更大的荣幸（他的亲生母亲现已死）。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没有过一次选举如此平静、如此一致……王国所有的尊贵夫人都到了，她们居于一大群的贵族之间……被所有的男士与女士的声音欢呼着时，我有一种满足感……但你为何不在场呢？你应该提名你的儿子的。

从这封信我们可“看出”他的“母亲”后来步上坎坷的欧洲大路，来造访她在华沙皇宫的“儿子”（1766年）了。她对法国与波兰文明的差距，没有一点实际的概念，因而她希望他能在一年内将落后一个世纪的波兰大肆整顿赶上他国。但她的这个建议带给他诸多麻烦，因为她使波尼亚托夫斯基紧张地表现才能，尽量地尽儿子应有的孝心。她回去时，虽然他以一番好话和用钻石镶嵌的自己的画像送给她、安慰她，其实在内心里觉得松了一口气。回国之后，他对他的爱趋于狂热，她从维也纳写给他的信中，肯定他对他的“感情是我生命中不可少的东西”。

波尼亚托夫斯基尽全力而为。第一年，他对政府上下的大小事务尽忠职守。他日日参与他的大臣们的议事，并工作至深夜，对任何问题了如指掌。他成功地施行了几项措施，训练出一批才干超群、完美无缺的文官。他使自己尽量地平易近人，以和蔼可亲而不以其对改革的热心来吸引人，但是他这一股精神被他对叶卡捷琳娜甚至对俄军的依赖感减损、冲淡。这些俄军是她派留在波兰境内，以保证他的安全并令他服从的。她的大使奥托·斯达克伯格伯爵监视他，以免他忘了后台老板俄国。

他受到远近各处的敌人的包围。当时，波兰的权贵分成两派：一派以波托茨基

家族为首，要求在改革施行之前独立，同时希望保持贵族的强盛，以牵制王权；另一派以卡扎托斯克家族为首，主张先行改革，他们认为当时波兰的混乱情势，国力太弱，无法摆脱俄国的保护。卡扎托斯克家族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支持犹豫不定，因为他们对他的放纵奢侈和眷恋女人感到十分悲痛。国会准他每年花费220万泰勒，1786年提高到614.3万基尔德——后者约等于政府年收入的1/3。他的花费比这还多，他从国内和海外银行到处借钱。国家曾两度偿还他的债务。然而，1790年他仍负债1150万基尔德。他和叶卡捷琳娜一样，想以大兴土木作为他执政的永久纪念。他自己和他的仆从来来回回地在两处富贵华丽的宫殿中过日子。他耽于昂贵的享乐，他滥施赠礼给艺术家、作家和女人。

他个人的魅力也让他有所付出。继位时年仅32岁，潇洒而有教养，大方而仍未婚，于是吸引了渴望得他青睐和他财源的大批美女。一些无法同他结婚的女人，也都乐意与他同床，而一些巴黎来的女演员同样欲得国王宠幸。卡扎托斯克家族抗议。他承认过错，但不改恶习。最后，一位女郎名叫帕尼·格拉伯斯卡终使他走向圣堂，秘密地结了婚。此后，他的性生活备受监督，因而较有时间参与政事、文学和艺术。

他本人对艺术家和当时作家的作品与生活非常感兴趣。如同叶卡捷琳娜一样，他收集绘画、雕像和书本，建了一座艺术陈列室和图书馆。在图书馆内，给了伏尔泰崇高的尊荣。他替当地的艺术家找事做，也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请来一些艺术家。皮拉内西和卡萨诺瓦两人不能来，但他们在意大利替他做了很多作品。他将王宫的一部分改为艺术学校，同时提供一大笔资金，使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能到外国进修。他在华沙附近建了一个瓷器厂，其产品优良，可与梅森和塞夫尔的产品媲美。他鼓励富有的波兰人——如阿达姆·卡扎托斯克、伊丽莎白·鲁勃米斯卡、海伦·雷得兹维尔——收集艺术品，聘雇艺术家，并重新建造和装饰其华丽的居所，以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来取代萨克森时代的洛可可式样。但他本人喜爱古典与巴洛克两种风味的调和。达莫纳克·莫里尼就以这种风格来设计波兰郊区的拉兹克宫。此外，外国画家也在训练一批新生的波兰年轻艺术家，这批人在波兰失去自由后也都成熟了。

腓特烈大帝在波兰自身的改革过程中设下的障碍，是波兰走向灾难的第一步。到目前为止（1767年），叶卡捷琳娜似乎仍然不愿瓦解这个显然一切已受俄国影响的波兰。瓜分会扩大普鲁士的领域，这比一个听命于斯拉夫的波兰，更能构成俄国参与西欧事务与文化过程的重大障碍。她对能要求波兰给予非国教教徒百姓充分的

民权，已感到满足。然而，腓特烈大帝的要求不仅止于此。他永不认为西普鲁士这一大多数居民皆为日耳曼人和新教徒的地区，应该归波兰人和天主教徒统治。因此，瓜分某些部分的波兰领土是他永难忘怀的目标。波兰本身所生的任何力量，无论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会阻挠这一目标的达成。因此，他在波兰的代理人赞同自由否决制度的维持，反对波兰国家军队的组成，而对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也表示欢迎，因为这为其入侵提供借口。

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天主教教士阶级的不宽容态度，与腓特烈大帝的计划恰恰不谋而合。它反对任何给予异教徒民权的措施。在白俄罗斯——当时是波兰国土的一部分，包括明斯克一带，罗马天主教当局从希腊正教会手中，接收了200所教堂，而将其交给唯一神教派教徒。东正教社区则不被获准修补他们破旧的教堂，也不准翻新或再建新教堂。波兰的孩子们从父母手中被抱走，在罗马天主教会教养下长大，以服从其权威，这种情形更是很普遍。东正教教士百般受到刻薄的刁难，有些甚至被处死。波尼亚托夫斯基虽然赞同宗教宽容，但是他明白国会会反对承认非天主教徒的国会代表权的任何措施；同时，一旦有必要的话，他们会使用武力。而他也认为这一提议务必暂缓实施，至少等到自由否决权部分地被限制时，他推行计划的力量才能加强。腓特烈与叶卡捷琳娜两人都回答波兰说，他们除要求他们各自在波兰境内的少数教派教徒能受到赐惠外，对波兰是别无所求的。普、俄、丹麦与英国对1766年10月和11月开会的波兰国会，提出了请愿书，要求他们在波兰境内的相同信仰者，能够享有充分的民权。

然而，代表们听完能言善辩的克拉科主教卡杰坦·索蒂克慷慨激烈的演说后，群情激愤，不但要求驳回请愿书，而且要求处死他们在波兰国内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是波兰和上帝的叛徒。一位代表企图替请愿书辩护，但备受攻击，险些没命。波尼亚托夫斯基为了使激动的国会冷静下来，发行一本小册子，名为《一位好市民的深虑》（*Considerations of a Good Citizen*），呼吁全波兰人团结一致，并警告人民，分裂只会招来外侮。同时，他要求波兰驻圣彼得堡大使力劝俄国脱离请愿诸国的联盟。他写道：“若这种情况持续不变，那么结果必定是一个对非国教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及带给我一次拉维立克（*Ravallac*，暗杀之意）的大成果……女皇会使我这件王服变成复仇之袍。我将不得不在放弃她的友谊和与国家为敌两者之间做一抉择。”叶卡捷琳娜通过她在华沙的大使尼克莱·列普宁，如此回答他：“我想不通何以一个国君只因支持合理正义的请求，就幻想自己成为国家的叛徒。”由于空间上的距离与教育上的不同背景，她实在觉察不出波兰人那股高昂情绪与骄傲造成的

燎原之势。一群新教徒贵族在桑恩城组成一个联盟，而卡扎托斯克斯一派人士在拉多姆组联盟时，叶卡捷琳娜囑令列普宁告诉他们俄国国会出面保护。以这个借口，俄国陈兵八万于波兰国界，一些更已进入华沙。

国会于1767年10月复会。泽卢斯克和索蒂克两位主教鼓励代表们坚定立场，反对任何宪政的改变。列普宁越过波尼亚托夫斯基，以侮辱女皇为名逮捕了主教与两位俗人，将他们送到莫斯科西南90英里处的卡卢加（Kaluga）。国会抗议，列普宁警告道，若他们进一步反对，他将送40个而非4个代表出境。1768年2月24日，国会终于对战争的威胁低头，同时与俄签约，接受叶卡捷琳娜的全部条件：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非国教徒任国会代表与公职的资格；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之间的诉讼，要由混合法庭审判。国会、叶卡捷琳娜和腓特烈对该约有关自由否决权除一些经济上的立法外仍然保留的安排，感到非常满意。国会谦逊地接受叶卡捷琳娜为新宪政的保护人。对此，她保证只要这种和解关系持续不变，波兰的国家领土必然完整，她对波兰人不仅给予波兰人超过英国人享有的宗教自由，同时阻止了腓特烈瓜分的计划，感到非常欣慰与满意。波尼亚托夫斯基受到哲学家的恭贺，人民却指责他。

第一次瓜分（1768—1772）

波兰的爱国志士与教士们同意腓特烈的看法，即不接受这一情况的安排。罗马天主教教士强烈地指责波兰沦为俄国异教徒的附庸。卡米内克区的主教阿达姆·克拉辛斯基和约瑟夫·普拉斯克（即为美国独立奋斗的卡西米·普拉斯克的父亲），在各地讲道和散发各种小册子，试图唤起波兰人保护他们的政治自由与宗教独裁。在国会向列普宁屈服后的一周内，一群波兰人在波属乌克兰的第聂伯河上的小镇巴尔城，组成巴尔联盟（1768年2月29日）。该联盟在财政上的支持者都是对叶卡捷琳娜与国王深怀怨恨的大地主。腓特烈对他的党羽原本的称呼为“白痴的群众”，现在这些群众心中燃烧着熊熊烈火，为唯一真正的信仰义愤填膺。这股激情更由诗人以沉重的哀婉语调道出，他们痛感波兰所受的奇耻大辱和国王的“叛离”。于是武器与资金纷纷从土耳其和奥地利送到爱国志士手中，达姆瑞兹更从法国来到此地，将民众组成战斗团体。一心一意想恢复萨克森王朝的波兰人也加入这一运动，于是这一运动在短时间内就蔓延到全国。列普宁向叶卡捷琳娜报告，“全波兰烈火将烧”。波尼亚托夫斯基想加入这一联盟，但联盟里的死硬分子吓走了他，他们警告

他，即使不处死他，也要将他罢黜。若我们相信伏尔泰的报道，30个联盟在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会师宣誓：

我们乘着一股神圣和宗教的热心，下决心替斯坦尼斯拉斯·奥古斯都触怒的上帝、宗教和我们的国家报仇，他是神圣法和人间法的唾弃者，是异教徒和非教徒的颂赞者，在圣母神圣的圣像前，我们保证并发誓要将践踏宗教、侮辱圣母的他，从这个世界上除去……请上帝保佑我们！

列普宁下令俄军平乱。他们把巴尔联盟军民赶到土耳其边境，并烧毁一座土耳其城镇，土耳其于是对俄国宣战（1768年），土耳其要求俄国军队撤离波兰，还波兰自由。哥萨克人利用这一骚乱入侵波属乌克兰，不分青红皂白地恣意杀戮地主、犹太司务、罗马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居民。在某个镇上，就杀害了1.6万名男女和儿童。联盟方面也以牙还牙，谋杀了所有能逮得到的俄国人和非国教教徒，因此清教徒和犹太人连遭两方面的杀害。在这几年间（1768—1770年），有为数5万人的波兰居民死于战争的屠杀中。

现在，到处都在谈论波兰如何被瓜分一事了。波兰内部联盟也被其敌人指控为与其外国盟友联合瓜分波兰。1769年2月，腓特烈大帝修书致圣彼得堡，提出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的建议案。叶卡捷琳娜回道，若普奥愿协助俄国将土耳其人驱出欧洲，她将同意普国占有部分波兰，即隔开普国主要本土与东普鲁士的那部分波兰土地——其余的波兰领土归俄国保护。腓特烈不以为然。法国方面的舒瓦瑟尔，则力劝奥地利务必取得紧接匈牙利边境的波兰领土。奥地利认为这是好主意，也是行事的好时机。于是1769年4月，占领了波兰的斯普兹（Spiz）省。该省1412年曾由匈牙利抵押给波兰，后一直未赎回。1770年，战争中暂时成为波兰共同防卫者的土耳其，向奥地利提出一个两国瓜分波兰的计划。

这些各色各样、不同形式的谈判不断进行着，西欧列强本身觉得波兰的瓜分是它本身政治上的混乱、宗教上的仇视、军事上的无能注定的结果，“欧洲大陆上的政治家都认为这一灾难无法避免”。但是在波兰内部联盟的波兰人，此时仍要求一个国会代表，前往西欧要求社会主义哲学家马布利和反派哲学家卢梭两人，替波兰人起草新生的波兰需要的临时宪法。1770年至1771年，马布利提出他的建议案。卢梭则于1772年4月，即第一次瓜分条约签字后两个月，才完成他的波兰宪法。

巴尔联盟（上文所指的波兰内部联盟）在其溃败之前，也曾制造出几回高潮。

1770年3月，它在土耳其城市瓦尔纳（Varna）宣布罢黜波尼亚托夫斯基。1771年11月3日，一些联盟分子截获了他。是时，他趁夜离开他的一个叔父的家，联盟分子的声势与力量压倒了护驾者，在先行射杀了一位护卫者后，即将国王拖出马车，用刀抵住他的头，然后将他自首都绑架而出。行经贝勒尼森林时，遭到巡逻队的攻击。在一场混战中，波尼亚托夫斯基乘机逃走，他立即通知皇家警卫，他们出城护驾，一场战斗到破晓方告结束。凌晨5时，国王衣衫褴褛、血渍斑斑地回到宫中。从此，政府与联盟方面妥协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波尼亚托夫斯基倒向俄国怀里，联盟军几乎全被镇压，最后只剩一些残余分子留在土耳其——这正是新月旗护卫着十字架（1772年）的场面。

这时，俄军向黑海与多瑙河的推进，深深困扰普、奥两国，腓特烈二世和约瑟夫二世都不乐于见到俄国控制黑海，更不希望俄国控有君士坦丁堡。根据1764年和1766年的条约，普鲁士保证俄国一旦遭受攻击，即出面援助。土耳其在名义上成为1768年俄土战争的攻击者，普鲁士现在却因援救俄国而殃及本身。奥地利则对俄国军队进入瓦拉几亚，愤愤不平，因此威胁要与土联盟对抗俄国。如此一来，俄国即可要求普国攻击奥地利了。但是腓特烈已受够了战争之苦，他为了攻下并占有西里西亚，已打过两次战争。难道要再兴战事吗？不，他希望运用外交途径。也许运用得当，三强可因瓜分波兰土地而互相妥协。而俄国大使已是波兰的真正统治者，若旷日持久，俄国准会用尽所有借口将波兰完全收归在其领域之内。现在是否来得及挽回呢？是的，假如叶卡捷琳娜答应只取得波兰的东部，从多瑙河撤军，腓特烈可取得波兰西部。倘若奥地利有机会分赃，是否会缓和它的好战心呢？

1771年1月，腓特烈的弟弟亨利亲王，在圣彼得堡向俄国外交官提出瓜分计划。帕宁反对道，俄国已保证保卫波兰的领土完整。但他提醒，这一保证是以波兰遵守新宪和结盟俄国为重要条件的，现在众多的国会代表加入巴尔联盟，这一承诺自然失效。但即使如此，叶卡捷琳娜也不很乐意。她心想，为何要与腓特烈分享她即将全部取得的波兰呢？为何要给予普国更多的土地、资源、波罗的海港口和更多壮汉组成的军队而强化普国呢？但是，她也不想与腓特烈打仗。腓特烈有18万人的军队。她更希望用他来阻止约瑟夫与土耳其联合以对付俄国的举动。她现阶段的目标是黑海而非波兰。1771年1月8日，在一次舞会中，她突然向亨利示意她初步同意腓特烈的计划。

对如何分赃的谈判，前后共花了一年时间方达成协议。腓特烈要但泽港，叶卡捷琳娜反对。对此英国也反对，因为它与波罗的海的商业贸易都要依赖该港口。奥

地利却为此大肆动员，暗中与土联盟。1772年2月17日，腓特烈与叶卡捷琳娜签了瓜分波兰的“协定”。叶卡捷琳娜放弃俄国对瓦拉几亚与摩达维亚的权益要求，安抚了约瑟夫。而1771年的大歉收，也使约瑟夫不能充分给养军粮。另一方面，玛丽亚·特蕾莎劝阻她儿子不要参与波兰大劫。腓特烈与叶卡捷琳娜两人已经开始实际占领其自封的领域，情势迫他非签约不可。1772年8月5日，约瑟夫终于在该约上签字。

令人诧异的是，该条约竟允许波兰保有其2/3的国土和1/3的人口。奥地利取得瓦哈依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南波兰、加里西亚和西波多利亚三个地方，总共面积2.7万平方英里、人口270万人。俄国则取得从东波兰到杜味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总共面积3.6万平方英里、人口180万人。普鲁士取得除了但泽与桑恩两地外的“西普鲁士”，面积1.3万平方英里，人口60万人。腓特烈分得的最少，但他成就最大，因为他成功地促成几位阴谋家和平解决冲突，同时，正如他们所说的，他已将西普鲁士与东普鲁士和勃兰登堡“缀补起来”。爱国的特赖奇克认为，这毕竟只是使德国恢复“条顿民族原来的景观……的据点，可爱的维斯萨山谷。往昔，是日耳曼武士与蛮族奋战过的地方”。腓特烈也提醒欧洲人，西普鲁士的居民绝大部分是日耳曼人 and 新教徒。叶卡捷琳娜则指出，她取得的区域完全是讲俄罗斯语、信希腊正教的人民定居的地方。

三强立刻以军队占领其各自的新领域。波尼亚托夫斯基呼吁各国政府出面制止瓜分，但他们太忙了。法国正准备与英国交战，并不想阻挠其盟友奥地利；英国则应付即要发生的美洲殖民地叛乱，而法国与西班牙皆有可能介入或者构成威胁，乔治三世（当时的英王）建议波尼亚托夫斯基祈祷上帝帮忙。瓜分诸国要求波兰召开国会，确认波兰的新国界，波尼亚托夫斯基虽然拖延了一年，最后仍在格罗德诺（Grodno）召开国会。许多贵族和教士拒绝参加，有些人虽然与会但表示抗议，结果被送到西伯利亚，其他人有的接受贿赂，最后这一残余国会自己变为一个邦联式的组织（其中波兰法律规定行使多数决议），并签约放弃了被三强所夺的领土权（1773年9月18日）。波尼亚托夫斯基同玛丽亚·特蕾莎一样，挥泪签署。

西欧承认了第一次瓜分，以其为阻止波兰完全落入俄国手中的唯一方法。据说有些外交家对“列强仅取得1/3波兰领土的节制作风甚感诧异，因为他们只要要求，就可得有全部”。哲学家们则感到欣慰，因为怠惰昏睡的波兰人在其开明的专制君王给鞭打后现已觉醒过来。伏尔泰称这次瓜分是残废者的历史性败退。当然，有组织的力量必定压倒反动派的无能。

波兰的启蒙时期（1773—1791）

波尼亚托夫斯基现在必须在俄、普之间选定一个保护人和主人。他选了俄国，因为它比较偏远，而且只有它方能阻止但泽与桑恩落入普国手中。叶卡捷琳娜也很急切地阻止普国的进一步扩大，普国的陆军在当时可谓俄国西向扩展的最大障碍。她训令俄国驻华沙大使就合乎俄国利益的各种措施，全力协助波兰国王。她送给波兰国王帕宁设计的更有效、更能运作的波兰宪法的建议案。该案保留君王选举制与自由否决制，但大事增强王权，因为该案设立一个由36位代表组成的永久委员会，由国王任主席，并作为他的行政大权机构，在其底下分设警察、司法、财政、外交和国防诸部。同时，该案建议设置一支3万人的正规军。贵族深恐该支武力会危及其对国王的控制，因此将其减至1.8万人。除了这一修正和其他的一些小修改外，1775年的国会批准了新宪法。波尼亚托夫斯基现在可以使国家恢复一点生机了。

贪污腐败一如往常，但无政府状态已消失了。游击队已被剿清，国家经济开始发展。河流的深掘工程使大船可以通行无阻，运河的开辟则连接了河流。1783年完工的一条“皇家运河”，连接了波罗的海和黑海。1715年至1773年，波兰人口从650万人增到750万人，国家收入增加一倍。国立学校的一套制度也建立起来，教科书有了准备，也有了供应，克拉科和维尔奴两所大学恢复旧有规模，国家更设立许多师范学院并提供一切基金。波尼亚托夫斯基喜欢与诗人、记者和哲学家为伍。据考克斯的记载，“国王每周四招待最具学识与能力的文人聚餐，而他本人当主席”，以引发对书本和许多观念的讨论。他请三位作家与他同住，并私下以津贴支持其他作家的生活。成千的波兰人虽然信从教会，但他们阅读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卢梭的作品，甚至有些为教会工作的教士亦然。波兰的启蒙或者说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启蒙已经有了基础了。

耶稣会教士阿达姆·纳鲁兹维茨的诗令国王爱不释手。因此他被提升为主教，但他不断地谱出赞美大自然的田园诗，他的《太阳颂》和《四季》两首诗，使那些能看懂波兰原文的人一直深爱着他。他的讽刺诗喜用一般普及的语言写成，有时是拉伯雷式的文体，有时是世俗文体。波尼亚托夫斯基要他写一部可读性高但不乏学术价值的波兰史，于是纳鲁兹维茨花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一部以史料真伪辨明著称的著作，共有6卷（1780—1786年陆续出版）。波兰第二度遭瓜分时，他伤了心，自此郁郁不乐，在最后一次瓜分的那年去世。

该时期最杰出的波兰作家是爱格纳西·克拉斯克。在旅游期间，他赢得了伏

尔泰和狄德罗的友谊。后来成为教士，最后升为红衣主教。但波尼亚托夫斯基鼓励他发挥他的诗才。在一首仿英雄体诗（1775年）中，他讽刺他那个时代的战争是鼠辈之间的战斗。在1778年写成的一首诗中，他取笑那些修道院内的争执——称其为通往神学坟墓的致命武器。在散文方面，他在1776年创作的一部书中，叙述一位年轻的波兰贵族，身负时下的学识与感情风尚，遭海难后流落到一个奇异的岛屿上，发现岛上仍然处在“自然状态”中，但男男女女又勤奋又守德。在模仿荷马、斯威夫特和笛福这方面的作品后，他采用艾迪生的体裁，出版了一系列的浮世画集（约1778年），描写一位标准绅士和市民的生活。在1779年的作品《寓言与格言》（*Fables and Parables*）中，他以尖酸的讽刺语，攻击在他周围横行的虚伪和残酷事实，堪与菲得洛斯和拉封丹媲美。他最后给人类的一点建议颇有贺拉斯之风：找个安静的角落，让幸福悄悄地降临。

虽然法国启蒙思想对纳鲁兹维茨和克拉斯克的影响因为其尊重教权而减弱，但在斯坦尼斯拉斯·特伦贝茨基身上大收其效，特伦贝茨基不提宗教则已，一提则必敌视。他的诗崇拜自然，但并不常带有那种激发情感的快乐逸致。他更喜爱大自然狂野的一面——比如动植物疯狂的盛况，暴风雨和大雷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他寓言的体裁是拉封丹式的，但充满卢克莱修的精神。他的诗的气势、精致和完美，替他赢得了波兰文学界高潮时代的崇高地位。后遭审判时，波尼亚托夫斯基自始至终支持他，而国王被罢黜时，诗人陪他流亡至死。

宗教诗非常之多，因为宗教是波兰个人和国家悲惨命运的最后慰藉。卡尔平斯基的《晨歌》、《晚歌》和《基督就要降临》，既是文学作品，又是虔诚的信仰表现。卡尔平斯基很轻快地超越了宗教与性的古老对立，而在任命圣职之际，却发现了阿那克里翁和爱情。他出版《情欲》（*Erotica*, 1770年）一书，追求人间的幸福，但又皈依宗教，后疯狂而死。由此可见，企图中和两大极端事物必导致疯狂和引发哲学思考。

在戏剧方面，主要人物是沃基斯·博古斯瓦夫斯基。波兰人誉他为“波兰戏剧之父”。我们或可称他为波兰的加里克，波兰人却宁愿称加里克为英国的博古斯瓦夫斯基。他的确是一位将一生献给舞台的波兰人，他曾为演员、剧作家和制作人，曾为华沙和利沃夫常设剧院的导演，也曾为剧团经理，将戏剧欣赏在国内外推广。他推出莎士比亚和谢里丹，而他本人也写了许多喜剧，其中一些在波兰舞台仍不时地上演。波兰这一时期的最佳剧本是朱利安所作的《代表的归来》（*The Deputy's Return*），剧中那位改革派的代表将爱心献给一位其双亲护卫地主和过去生活方式的

少女，戏剧性地表现出政治危机和冲突的两面。

波兰这一时期出现的繁星中，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是科翁塔伊。他的教育使他感染上浓厚的哲学思想，但他隐藏了这种异端思想，因而获得克拉科舒适的圣职。科翁塔伊年方23岁，即草创出一种当时最好的教育改革计划，因此，波尼亚托夫斯基任命他为教育委员会委员（1773年）。27岁时，他被赋以重整克拉科大学的重任。他花费几年的时间将它整顿完成，并留任为校长。在《一个匿名作家给国会议长的信》（*Letters of an Anonymous Writ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Diet*, 1788—1789年）和《波兰国的政治法》（*The Political Law of the Polish Nation*, 1790年）两部作品中，他提了一些建议，后成为1791年宪法的蓝本。

由于诗人与政论家的鼓吹与激励，波兰人开始振作了，他们欲图将波兰建设为一个有效率、有防卫力量的国家。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向1788年至1792年那一届“四年国会”提出结盟的建议时，他们等到了一个好的机会，因为强大的普鲁士竟要保证他们免于受到任何外强的干预。同时，这时的俄罗斯正忙于同瑞典和土耳其作战。因此，这正是波兰脱离它长期屈居叶卡捷琳娜之下的羞辱生活和结束俄国大兵在过去25年对波兰国土蹂躏的最好时刻。不顾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反对，国会解散了国会本身的常设理事会，通过了一个议案，征募一支隶属于国会的10万大军；同时，下令俄军即刻撤离波兰（1789年5月）。叶卡捷琳娜由于当时无暇无力顾及波兰，不得不让步，但她发誓要报复。1790年3月29日，波兰国会与普鲁士签订联盟。

这时的波尼亚托夫斯基陶醉在自由的气氛里。在毅然弃绝他对叶卡捷琳娜的依靠时，他带头起草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王位世袭，但确定无子嗣的波尼亚托夫斯基死后，萨克森家室有继承权。国王的行政权稍加扩大，因为宪法上列有他的搁置否决权——他能使国会通过的法案不能成为法律，除非下一届再次通过。国王也有权任命大臣和主教，并有军队的统率权。自治市和小城镇的居民也有了几个国会代表名额。国会分成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本身可单独立法，但要获由主教、省长和大臣组成的参议院的同意，才能成为法律。任意否决权改以多数表决制代之。新宪法更承认罗马天主教是国家的宗教，背叛它是一种罪过，但又保证全体人民的信仰自由。奴隶制仍然保留，但农民现在可以从世袭的法庭上诉到省级或国家法庭。美国宪法（1787—1788年）在这些建议案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曾经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兰人可谓替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一改革铺路，而他本人也未曾忘了他阅读洛克、孟德斯鸠和其他哲学家的作品时所获的心得。